

乐 亭 文 史

(第 二 辑)

政协乐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月

目 录

冀东抗日大暴动.....	李运昌 (1)
教师的榜样.....	李欣华 (29)
李大钊与白眉初.....	据卢龙县政协文史资料整理 (34)
李大钊的家世初考.....	刘荆山 (40)
李大钊与私塾老师.....	刘荆山 (45)
李大钊在哈尔滨.....	刘荆山 (50)
冀东大暴动在乐亭.....	李天林 (54)
回忆外祖父岳泽普的一些革命活动.....	梁建华 (65)
武百祥的生意经.....	杜士林 (74)
晚清至本世纪三十年代	
乐亭县皮影班社简介.....	魏革新 (90)
张厉生青少年时代二三事.....	王占云 (98)
著名御医邸寿臣.....	王占连 (101)
回忆我的父亲韩香圃.....	韩志学 (104)

冀东抗日大暴动

李 运 昌

发生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到十月的冀东抗日大暴动，是我党在敌后组织的一次有二十万工农群众参加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在日伪军政的残酷统治和严密控制下，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发动起有这样多人参加的遍及冀东的武装起义，是党中央毛主席开辟敌后战场，开辟冀东游击战争方针的胜利，是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使工人和农民相结合、争取同盟者，实行统一战线的胜利。

冀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北据长城，南临渤海，西控京津，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要道，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理想战场。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物产可资军需，而且有深山密林可供迂回。所以，自古以来，凡有战略眼光的将帅无不想据而有之。

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后，为吞并整个中国，必须要先行夺取冀东。所以，早在一九三三年初，他们就兴兵攻占长城各口。当时，驻守在喜峰口、冷口、古北口一带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在当地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下奋起反击，后因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而告失败。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将军率“民众抗日同盟军”发动了“察北抗战”。就在“察北抗战”的捷报不断传来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竟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一意迎合日寇，卖国求和，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同日寇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协定中规定：“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

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即把冀东划为所谓“非军事区”，实际上是把冀东主权拱手让给了日寇。到《何梅协定》达成以后，冀东就完全沦陷了。成为日寇扩大侵华战争的兵站基地和军事跳板。

冀东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人民，他们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一九三三年冬，冀东北部的迁西就曾发生过人民的武装暴动。但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迁西暴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党和群众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兴隆县的孙永勤掀起抗日的义旗。这支队伍在我党的帮助下，曾在长城内外辗转抗日，战绩累累。国民党反动派竟同日寇暗中勾结，将起义军诱骗到遵化县境内，然后四面围攻，致使起义军伤亡一千多人，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壮烈牺牲，剩下的一千多人突围星散，长城内外一片恐怖。

一九三七年五月，我赴延安出席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听了刘少奇同志作的《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和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讲话，心里亮堂多了。在白区工作会议上，我汇报了冀东的情况和冀东党的想法，同时，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的文章，反映冀东人民迫切盼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心情。

当时，毛泽东同志以他的雄才大略和对整个战局的了解，已经注意到冀东了，并开始酝酿一个大胆的出奇制胜的计划。七七事变后不久，我党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抗战爆发后的国内形势，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亲自主持制定了开辟华北敌后战场的具体计划。会议还根据毛泽

东同志关于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①的指示，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在孤悬敌后的冀东开辟根据地，无疑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当时，只有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才具有这样的胆略和气魄。

洛川会议后，我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西，首战平型关，然后分兵进驻五台山区，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准备按中央的决定进一步开辟冀东。为了配合八路军的军事行动，刘少奇同志指示河北省委，立即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组织抗日游击战争。这是去临汾向北方局汇报工作的李大章同志回天津传达的。具体内容是：我八路军已渡过黄河，正向太行山及北岳区进发，河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党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城市工作要由公开、半公开的活动转入秘密活动，埋头苦干，积蓄力量，动员一批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等去农村，并尽量去平津周围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准备发动冀东和平西的游击战，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少奇同志还强调指出：冀东和华北的其他地区不同，它是一个战略要地，因为敌人有多年的统治基础，所以发动游击战争的任务将是很艰巨的，同时它又有很有利的条件，冀东有我党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党组织有一定的基础，群众不堪忍受敌伪的长期残酷剥削和压迫，有强烈的抗日要求，加之华北敌后我党我军已广泛行动起来，全面抗战的形势正在展开，这对冀东群众是很

大的鼓舞和推动。因此，要不失时机抓紧准备冀东武装暴动。因为我是冀东人，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少奇同志决定要我速回冀东，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立即着手组织发动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

我接到少奇同志的指令后，当即向马辉之等同志交待了工作，于一九三七年十月秘密回到了冀东。我走后由马辉之继任省委书记，姚依林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李大章调北方局工作。

我到冀东后，很快就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王平陆等特委负责同志接上了关系，并开始工作。当年十一月，党又派胡锡奎同志赶来冀东，到北宁铁路南组织京东特委，以便发动群众，同冀热边互相配合，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此，北方局还派红军干部李润民、孔庆同二同志来冀东，协助我们开办军事干部训练班，培养暴动骨干。李润民、孔庆同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来后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又给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同时发来电报，指示说：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这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要作充分准备。并且指示，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②。根据这一指示，晋察冀军区从八路军中抽调了一支队伍与一部游击队，先行开辟平西（今北京西部），取得前进基地，作为挺进冀东的第一个步骤。

河北省委也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专门就冀东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省委认为，冀东的党组织成立较早，在群众中有深厚的基础，特别是自一九三六年刘少奇同志主持北方局工作以来，纠正了“左”倾错误，使党的组织

和革命力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在八路军的直接配合下，发动冀东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于是陆续向冀东增派干部和平津的革命学生，为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做准备。同时，在天津成立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由军委书记林铁同志负责，培训干部。

当时，在冀东发动武装起义确实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这里有坚强的富有斗争经验的党组织，有经过斗争锻炼的干部、群众。由于日寇侵占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尔后又在冀东成立了汉奸政权，冀东人民深受蹂躏之苦，所以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冀东不仅地势有利，而且人和——革命干部、群众及其同盟者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是团结的。团结抗日，是起义成功的先决条件。

冀东南有平原，北有群山，物产极其丰富。起义军不仅可以在这里纵横驰骋，而且可以在这里得到物资供应和人力的补充。特别是这里的民间有大批枪支弹药。据当时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计，冀东二十二个县就有民枪二十三万多支。这样多的枪支对于武装起义军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在冀东发动暴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这里的工业发达，有一支觉悟高、战斗力强的工人队伍，特别是开滦矿工队伍。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在这里建立并开始工作了。工人运动在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共北方区执委的领导下，在王烬美、邓中夏的具体指导下，日益高涨。开滦同盟大罢工，北宁铁路罢工……而每次罢工都影响到农村。因为工人大都来自农村，他们同农民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工人的斗争不仅得到农民的同情，而且影响了农民，使农民的斗争觉悟逐渐提高。

为了把工农和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河北省委还广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专职负责人有李楚离、王仲华等同志。参加该会的还有许多教授和社会名流，如杨秀峰、张申府、杨十三、洪麟阁等。其中杨秀峰、杨十三、洪麟阁均是冀东人。不久，又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我任主任委员、洪麟阁、杨十三、高志远等都参加了这个分会。各县也相继成立了分会。分会大力争取地方士绅、乡保长和民团，共同抗日。仅丰润、玉田、迁安、遵化、昌黎、乐亭等县“自卫会”的会员即达一万五千余人。党还通过各种群众团体——救国会、齐心会、工会、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等，广泛吸收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说：“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³⁾。为达此目的，必须依靠党的组织做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因此，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进行抗日宣传，秘密印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写有“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等内容的标语和传单，传播我八路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揭露日寇在冀东各地的侵略暴行，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借以激发全体人民的抗日热情和必胜信心。正苦于没有出路的广大群众，经过党的宣传教育，看到

了前途和出路，纷纷加入我党领导的各种抗日团体。这样，工农基本群众就被团结到党的周围。

七七事变前，根据《塘沽协定》，冀东被划为“缓冲区”，冀东的地主、商人及其上层人物尚存苟安心里。但在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有了变化。日寇进一步强化他们在冀东的殖民统治，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步步紧逼，这就直接威胁到上层人物的切身利益。过重的军需摊派，加上特务的敲诈勒索和土匪的趁火打劫，闹得他们几无宁日。所以，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也开始倾向抗日，参加了“自卫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冀热边特委与京东特委在滦县的多余屯召开了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开得很热烈。除讨论了继续加强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外，还通过了立即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决议，并决定由特委军事部长王平陆同志负责组织一支队伍，立即开始游击活动。

会后，王平陆同志调集了一批党员和原有的游击小组，编成“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游击第一支队”，由他任司令员。在这支游击队夜袭伪“满洲国”的清河沿“国境”警防所时，王平陆同志不幸中弹负重伤，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光荣牺牲。王平陆同志牺牲后，由彭夫、孔庆同、高存等同志重整旗鼓，扩大队伍，继续斗争。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昼伏夜出，潜到长城外去打兴隆县药王庙等伪满据点。这些小规模远距离奔袭虽未取得重大成果，却为尔后的大暴动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准备了武器。特别是经过真刀真枪的游击活动，攻下敌之据点，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其本身就是很好的抗日宣传。

一九三八年春，根据北方局刘少奇同志电示，河北省委

派李楚离同志去阜平，向聂荣臻同志汇报工作。聂荣臻同志听完汇报后，请楚离同志转告河北省委：晋察冀军区已遵照中央指示，命一分区政治委员邓华同志率部抵平西活动，准备挺进冀东，配合冀东抗日武装起义，河北省委要派人直接和邓华同志联系。根据这一意见，河北省委又派楚离同志到平西，与邓华商定八路军东进计划和武装起义的有关事项。

当时，省委还根据邓华同志的要求，派人随部队行动，在省委和邓华部队间建立了直接联系。接着，河北省委通过“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天津召开会议。李楚离、王仲华、朱其文和我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国民党人士王若僖、赵显斋以及洪麟阁、高志远等人。这次会议，对冀东抗日武装起义作了具体安排。至此，河北省委认为，冀东武装起义的条件业已成熟，并把各方面情况及发动起义的想法及时向北方局作了汇报。

一九三八年四月，刘少奇同志急电河北省委，命省委负责同志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在给彭真、聂荣臻同志电报中指示：可分出一部分兵力随邓华部队向冀热边发展。五月下旬，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同志抵延安向中央汇报，少奇同志听了汇报后作了重要指示。马辉之同志回来后，传达了少奇同志的指示，主要精神是：冀东起义的准备工作是好的，但一定要看到，冀东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区，敌人决不会轻易放弃它；冀东不同于冀中、冀西、冀南等地区，它孤悬敌后，所以在那里发动起义，不但要有充分的准备，还要有八路军的策应和其他根据地的配合，否则，即便发动起来，也难以巩固和坚持；中央已派邓华、宋时轮率部挺进冀东，起义时间要以八路军到达的时间为准；冀东起义后，在天津的河

北省委即派马辉之、姚依林到冀东去，接受晋察冀军区和北方分局的领导，负责地方党政工作；起义后，要以八路军为主，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为了团结友党友军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在根据地建立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可请有影响又靠近我们的有威望的民主人士作冀察热宁边区政府主席；另外，冀东的民团、保安队、警察等，其基层成份多为破产农民，其上层人物中有的人也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对他们要注意争取、教育和改造，以扩大抗日武装力量。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在极其紧张的状态下进行了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这时，冀东又发生了两件对起义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一件是开滦煤矿三万五千工人的为时五十多天的大罢工；一件是乐亭、滦南三千雇工要求长活价（工钱）的斗争。

开滦大罢工发生在一九三八年的三月十六日。那时，开滦工人在日、英帝国主义压迫下，生活日益恶化，加上伪政府大量发行伪钞，物价飞涨。工人们挣来的那点工资，连自己一个人的最低生活也不能维持。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英国资本家还借口战争，煤的销路减少，决定取消工人的抚恤金，并减薪、减年终“花红”等，还以解雇工人、关闭厂矿相威胁，企图把工人多年争得的福利一笔勾销。为了生存，许多工人不得不打连班，挣钱养家。可是，矿上又实行了“井下记工制”，设立了“牌子房”，不准工人打连班。而工人们为了排队领工牌，还得搭上一两个小时。工人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三月十五日，赵各庄矿务局强行设立井下“牌子房”。工人们不干了，他们扔掉工牌，捣毁“牌子房”，开始怠工，

并于三月十六日夜間宣布罢工，提出取消“井下记工制”，每日增加工资一角二分，不准开除一个工人等三项条件，还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组织了武装纠察队。第二天早上，罢工工人包围了公事房，同“矿司”面对面地进行说理斗争。矿务局保安队蛮横镇压，公然开枪射击，工人们忍无可忍，呐喊着扑向矿警保安队，与他们展开激烈的肉搏。最后夺来步枪数十支，打散了保安队。工人们也为此付出了鲜血，有几十名工人负伤或献出生命。

三月二十四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林西、马家沟矿相继罢工。唐家庄矿资方为了防止本矿罢工，收买了一批工贼，成立了“护矿队”，对工人进行控制和镇压。赵各庄矿工人积极援助唐家庄矿工人，在节振国领导下，数千名工人手执斧头、大镐直奔唐家庄矿。经里应外合，共同战斗，击溃了“护矿队”。于是，唐家庄矿宣布罢工。唐山矿是敌人统治最严的一个矿，但经过斗争，终于也宣布罢工。这样，开滦五矿三万五千多矿工，就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步伐，统一口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经过五十多天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当年六月，乐亭、滦南爆发了雇工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那正是麦收季节，三千名农业雇工在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罢工，要求长活价。雇工们还喊出了“青纱帐起来抗日去”的口号。

开滦罢工和雇工斗争先后呼应，此起彼伏，打乱了敌人的统治秩序，取得了胜利，鼓舞了冀东人民的斗志，同时也使许多上层人物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增强了信心。至于共产党员，热情更高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惜辍粮、出地、卖牲口，筹措资金购买武器。有的同志实在无钱无物，就走亲

串友去借，甚至拼着性命同敌人抢枪。打进保卫团、警察所的同志，经过前一段工作，也争取了相当多的人。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河北省委为了便于对暴动实行统一领导，决定将冀热边特委同京东特委合并为冀热边特委，胡锡奎同志任特委书记，我专负责军事工作，任抗日联军司令员，并将暴动计划上报中央。时值日寇进攻武汉前夕，敌后兵力空虚，正是暴动的最好时机。中央北方局很快就批准了暴动计划。

由于没有无线电等通讯联络设备，又处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之下，我们不知道八路军挺进冀东的确切情况，所以在六月下旬召开田家湾子军事会议时，未能将八路军到达靠山集一带的情况考虑进去。田家湾子军事会议是大暴动的预备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我党的负责同志外，还有同盟者洪麟阁、杨十三及高志远的代表。会议通过了起义行动纲领，决定了起义队伍的名称是“冀东抗日联军”（下称抗联），番号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总队。抗联共分三路：一路司令是洪麟阁，主任杨十三，辖第一、第二总队；二路司令李运昌，主任是胡锡奎，辖第三（蓟县）、第四（丰、滦、迁）、第五（滦县）三个总队；高志远辖第六总队。为了加强党对同盟军的指导，河北省委还派党员干部王仲华、李楚离二同志以“华北自卫会”委员的身份，分别指导高志远和洪麟阁部，这样，大暴动就完全置于我党的领导之下了。会议决定在七月十六日起义。

三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央将活动在晋西北的宋时轮支队调

来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下称四纵）。宋时轮、邓华同志分任司令员和政委。六月八日，四纵兵分两路向冀热边挺进。邓华同志率领的一路，连克敌人的许多据点，沙峪一战，全歼日军一百余人，使沿途敌军大为惊恐。宋时轮同志率领的一路，东渡潮白河，大踏步进入冀热边境，打州破府，不断告捷。六月二十日，蓟县民团队长夏德元、赵合，打死马申桥警察分局局长王树森后，率民团三百余人宣布起义，迎接八路军东进。六月下旬，四纵主力到达蓟县的靠山集、将军关、下营一线。二十六日，徐志，王维昕提前于丰润起义，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九支队（后改称第五支队，）先后打下三女河、牛郎山警察局和王官营民团团部。

四纵的快速东进，引起日军司令部的注意，他们慌忙调集冀东各地的日伪军，赶到长城线去拦截阻击。伪军、民团的士气本来就不高，从四面八方赶来时，还没有看到八路军的影子就自相惊慌起来，纷纷逃散。在逃跑途中，他们传出了“八路军来了”的消息。久盼天晴的群众，听到这个消息，欢喜若狂，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冀东全境。冀东的人心大为振奋，敌伪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动摇，革命的人民再也等不下去。

这时，我们又从打入伪“冀东道”内部担任警务科长的朱欣陶同志处得到情报：（一）我八路军部队已到达蓟县的靠山集一带；（二）为防止暴动，日军马上就要收缴散在冀东民间的二十三万支枪。

形势紧逼，情况危急，暴动不得不提前举行。

七月六日，滦县的高培之和李润民、张鹤鸣、张振宇等同志发动当地农民起义。那天夜里，三百名经过秘密组织的

骨干队员齐集港北村，宣布起义，成立了抗联第五总队，下设三个大队，李润民任总队长，高培之任政治主任，张鹤鸣任参谋长。天亮后，部队按原定计划四处活动，进行宣传、收集民间枪支、摧毁伪政权等工作。这些举动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们纷纷起来响应，有的带枪入伍，有的为起义队伍烧水做饭，呈现出一派胜利景象。

当时，冀热边特委和抗联第二路司令部都设在迁西的西庄村。这个村子是个山庄，又是地下党负责人魏春波同志的家乡，群众条件非常好。在魏春波等同志的努力下，仅在西庄一带就组织了一个暴动大队，暴动时，我和胡锡奎、苏林燕、孔庆同等同志就住在这里。在七七事变一周年那天，我们发出立即集合的命令，西庄、铁厂、王官营、新集等地的四百多名基本队员一齐拥向岩口村，在腰带山下打出起义的大旗。这支起义军编为第四总队，由孔庆同任总队长，阎锡九任副总队长，丁振军任政治主任（当时未到职）。

在起义那紧张而兴奋的日子里，胡锡奎、苏林燕、张志超、魏春波等同志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记得胡锡奎同志亲自写司令部、政治部的布告，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还坚持一笔一划地写，尽管他眼睛熬得通红，情绪却非常乐观。群众的情绪就更不用说了，起义前，他们赶做红旗、袖标，起义后，又为我们烧水、做饭、送信、贴标语和布告，连小孩子都跟在我们后头跑来跑去。

港北、岩口起义后，各地抗日健儿群起响应，遍地是红旗，遍地是赶来参军的群众，歌声、笑声、口号声夹杂着零星的枪声，真令人激动啊！

起义开始后，敌人还妄想扑灭这熊熊烈火。七月十日，遵化县伪保安队步兵和骑兵一百三十多人扑向我铁厂镇。四

总队闻讯后，在孔庆同领导下赶到铁厂北玉皇庙迎击敌人。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俘敌八十余名，缴马十一匹，余敌溃散。此役吓得遵化县敌人紧闭城门，再也不敢出城。接着起义军又攻克兴城镇。兴城镇西北面的重镇三屯营伪警察巡官宣布起义，并派代表欢迎抗联进城。迁安、遵化、丰润边境的起义群众，一齐向这里集中。在几天的时间里，四总队就扩大到一千四百多人，遂扩编出三个总队：十一总队，总队长阎锡九，政治主任徐振铎；十二总队（迁西澈河桥起义部队），总队长张秉东，副总队长程铁军，政治主任叶田（宋启兴）；十四总队（迁西新集，迁安杨店子起义部队），总队长陈汉民（后为苏然），政治主任韩东征。

四总队从三屯开到丰润的王官营，平息了那里的民团叛乱，又掀起一个人伍抗日的高潮。仅王官营一带就参加了二千多人，许多人都是带着枪支入伍。许多地主上层人物也主动捐款献枪，民团团丁、伪警察自动来投的很多，队伍很快就增加到四千多人。后来，一个总队实在容纳不下了，便将在丰润刘家营一带起义的刘锡彤、谷云亭同志所部扩编成第十三总队。这时，丰、滦、迁、遵各地党领导的起义，有如山洪爆发一齐奔涌而出。在遵化西部，李子华、马子敬成立了新五总队；在遵化南部，石林、甄凤阁成立特务一总队；在唐山北、刘锡纯、蒋林斋、岳武部一千五百余人成立了第十五总队……

在昌、滦、乐方面，李润民、高培之率领的第五总队于七月八日过北宁路，安各庄警察局长周维斌率全体警察和民团百余人起义响应，起义后与于振忠领导的昌黎起义军合编为第九总队。随后又有铁局寨、商家林一带起义队伍赶来集合，几天内就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

七月十五日，五总队和九总队（驻甄庄）转向北宁路

南，驻扎在糯米庄，邹家洼，杨家院一带。滦县伪保安队三百多人赶来镇压。李润民、张鹤鸣等决定打伏击，歼灭这股来敌。这天上午八时许，敌人排一字长蛇阵，耀武扬威地直奔杨家院而来。当他们刚刚进入半拉山口时，我事先埋伏好的部队突然开火射击。敌人除骑兵队外全部被歼，伪保安队长刘振被活捉，两个中队长被击毙。这一仗消灭伪军二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二百多支。

在第五总队南下到茨榆坨时，部队扩大到三千余人。这时高小安同志率领一千多人的起义队伍赶来会合，遂编成第十三总队。队伍开到司各庄与吴绍舟部队会合，编成第十四总队，在倚城与高志远的第六总队会合后，共同东进，进攻乐亭县城。攻克县城后，阎达开、李振华、黎巨峰、田自修、张其予等乐亭起义负责同志立即在城东，城西率千余人起义，并配合五总队攻下胡家坨镇。这支队伍编成第十总队。在我党的策动下，乐亭沿海的盐警队起义，成立第三十九总队，打下汤家河据点后，部队发展到三千多人。此外，在滦县，李永玺、石占山的队伍和乐亭县的王静安等部也发展到二千多人，于是又扩编了特务第一、第二总队和一个独立大队。

在蓟、玉、遵方面，由于四纵已进入蓟县边界，夏德元、赵合等已经起义。所以，蓟县党组织也提前发动了起义。在王崇实、李子光、王少奇、商香阁等同志领导下，以蓟县为中心开始暴动。七月十四日，他们突然袭击了邦均伪警察局，活捉伪警三十多名，成立了三区队，王建国为区队长，这就是“邦均暴动”。七月十五日，抗联第五总队成立，商香阁为总队长，王崇实为政治主任。这时白砥中、郝希武率众在下仓宣布起义，组建了五个大队。李子光、徐智甫、陈富轩、刘卓群在二区领导起义，成立第十六总队。石门镇警察